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中国财政学： 一个传统的移入与退出^{*}

马 珺

内容提要：20 世纪 50—60 年代既是新中国财政学初建时期，也见证了苏联财政学传统移入和退出的过程。就其理论和实践来源看，苏联财政学是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苏联特殊年代政治实践和计划经济体制等诸多因素的混合物。虽然它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的贡献，但其历史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在苏联财政学移植中国之时，其中一些负面特征也参与了新中国财政学的重建，并对其后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起到了长久的羁绊作用。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财政学“去苏联化”的目标未能完全实现，这一方面源于塑造苏联财政学的思维模式仍然在当时的中国财政学界起着支配作用；另一方面在那些影响财政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上，当时的中苏两国极为雷同。吸取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移植苏联财政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当下中国合理借鉴域外学术资源、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苏联财政学 新中国财政学 马克思主义财政学

作者简介：马 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100028。

中图分类号：F09，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0)04-0005-15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持续升温。2019 年 10 月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在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全面落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实，早在 2016 年 5 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向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拓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他强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有主体性和原创性”^①。他指出，我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态度应当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思想”，“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强调“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② 以上背景提出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大理论问题。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研究”（14ZDB121）；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 A 类项目“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研究（2018—2022 年）”。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建议。文责自负。马珺电子邮箱：majun@cass.org.cn。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第 2 版。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第 2 版。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学 70 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财政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重大学术引进过程。一是新中国成立前夕至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学术资源被移植到中国;二是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大规模、全方位引进英美学术资源。由此,苏联财政学和英美财政学成为新中国财政学得以借鉴的两大主要思想资源,对中国财政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20 世纪 50 年代的那次学术引进,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传统财政学的创立过程。从表面上看,苏联财政学在当今中国已经失去了曾经的影响力,然而事实比表象复杂得多。若干年来,苏联财政学及其背后的逻辑对我们的影响并未消失,笔者认为,回顾和反思这一历史过往,对于当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国情、合理吸收其他国家财政学的理论成就,促进中国财政学更好地实现创新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围绕 20 世纪 50—60 年代新中国财政学建立这一历史事件,探讨当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新财政学的历程,分析其中的成就与不足,以供当前财政学理论建设借鉴之用。文章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初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苏联财政学向中国的“移植”及其历史背景;第二部分回顾苏联财政学的产生,分析其理论和实践渊源、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第三部分分析苏联财政学对当代中国财政学的影响及历史借鉴意义;第四部分论述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新中国财政学的“去苏联化”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建立有中国特色财政学的首次理论创新尝试;第五部分为结语。

一、苏联财政学传统的移入(1949—1956 年)

作为一个新成立的由共产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949 年成立伊始的中国,在缺乏城市治理和经济管理经验的情况下,出于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和其他利害考虑,选择了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开始了一段模仿苏联模式建设国家的历史进程。苏联财政学因而在新中国的学术版图上落地生根,并在此后 30 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财政学的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

(一)与旧财政学传统切割

近代中国的财政学源自西方输入,1927 年(国民政府时期)以来,英美财政学传统对中国的影响尤为突出。当时,不仅英美等国作为华人留学目的地的地位更加重要,而且学成回国的学者亦开始著书立说,宣扬英美财政思想,并希望以此改变中国财政现状(邹进文,2010)。从其著作的引文来看,此时财政学者与国际学术的融合度非常高,能够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其译介到中国的财政类图书亦非常及时。国民政府后期的财政学著作,除了译介和模仿之外,更主要的是针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提出解决中国财政和社会问题的办法,马寅初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即是一例。此时的财政学界还创办了自己的专业刊物,如《财政评论》(1939—1948 年刊行于香港),定期编载《各国杂志重要财政金融论文索引》,跟踪国际学术动态。因此可以说,西方财政学,尤其是英美传统在中国的传播,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臻于成熟(夏国祥,2011)。此时,虽然马克思主义财政思想在中国也有传播,但在学术界并未取得主流地位,对主流政治经济决策也未产生重大影响(孙大权,2006)。

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旧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高等教育面临革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和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马叙伦,1998)。既然新教育被赋予了巩固与发展新政权的功能,那么,改造旧教育、与旧教育依托的旧学术传统切割就不可避免。

1. 接管改造旧学校

早在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接管北大、清华、燕京等高校。在接管的同时,改造旧学校、旧学人的任务也如火如荼地展开。1949年10月11日,华北高教会正式公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此规定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系任务和主干课程中的指导地位;二是教育思想的转变,从通才教育走向专才教育,注重学生对实用性知识的掌握;三是与苏联相关的国别知识类课程增多,已经显露了要向苏联学习的大趋势(杨悦,2015)。

2. 改造旧学人

为了“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1951年秋至1952年秋,党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主要目的是通过“学习时事政治和马列主义,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教育工作的实际,在人民内部开展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①

3. 培养新学人

在对旧学人进行改造的同时,新学人的培养也加速进行。一方面通过派遣大量留学生赴苏学习,直接接受苏联式教育。另一方面邀请苏联专家学者来华,在国内帮助培养研究生和新师资。这些促使新旧学术传统转换的措施很快就看到了效果。首先,原有的财政学人群体发生了分化。根据孙大权(2006)、邹进文(2010)等学者考证,旧学者中,部分人选择离开了中国大陆,而留在国内者,很多人在1949年以后不再延续原来的学术研究。一批原本就受到马列主义影响的或者新成长起来的马列主义学者,掌握了新理论的话语权,成为担纲新中国理论建设重任的一群人,财政学界也不例外。其次,学术传统的转换也体现在财政学教材的重大变化上。1949—1952年正式出版的财政学教材,均以探索新民主主义阶段财政理论为主旨。这一时期的主要财政学教材有:千家驹(1949)的《新财政学大纲》、伍丹戈(1951)的《论国家财政》、栗寄沧(1951)的《新财政学教程》、丁方和罗毅(1951)的《新财政学教程》、尹文敬(1953)的《国家财政学》等。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第二次科学讨论会财政组报告提纲》(中国人民大学,1951)也反映了当时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科的学术进展。通观这些著作,我们发现,当时的“新”财政学与“旧”财政学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声称以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指导新财政学的研究;(2)声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财政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财政问题上的应用;(3)声称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和国家的理论,作为财政学研究的方法论与出发点;(4)在内容安排上,基本上分为资本主义财政理论批判、苏联财政理论及其经验介绍、中国建立新财政理论的必要性及其框架设想等若干方面。后来盛行中国几十年的“收支平管”体系这时还没有形成。

(二)苏联财政学在中国的移植

1. 从“以俄为师”到“全面向苏联学习”

虽然向苏联学习、将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已经成为当时国家一切工作的主旋律,但党内外各阶层仍存在某些不同意见,对苏联经验的先进性产生怀疑,甚至产生抵触情绪。针对这一情况,1953年2月7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全面”学习苏联,“要在全中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②把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奉行的“以俄为

① 毛泽东:《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29页。

②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264页。

师”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这为按苏联模式改造整个教育系统彻底扫清了道路,在这一大潮之下,苏联财政学成为中国新财政理论建设唯一可利用的学术资源。

2. 苏联财政学传统的移入: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及其财政学科建设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等教育完全按苏联模式复制。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所以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型大学,它的成立就是全方位学习苏联的结果,是苏联社会科学传统向中国移植的样板。其建校目的非常明确,一是为了“正确而有效地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际”,二是为了“培养出以科学的社会主义知识武装起来的忠实于党和国家事业的财经、政法及俄文方面的专门人才与高等学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师资”(胡锡奎,1954)。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苏双方都付出了巨大努力。苏联派遣相应领域的专家来华工作,在教育体制、学生培养、师资培训和教材建设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指导。

1950—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聘请了98名苏联专家,是全国聘请苏联专家人数最多的高校,其中财政贸易领域专家共15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2017)。其间,苏联专家曾为中国人民大学2574名研究生授课,这些研究生毕业后或留校任教、或被分配到其他高校,成为中国各大院校财政学科建设的主力 and 中坚力量(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2017)。在对旧学校进行接管改造的过程中,由于课程体系变化了,旧教材基本上被弃之不用,大部分的专业教材都是空白。因此,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后,教材建设也是重中之重。除了翻译教材之外,“从1950年到1975年间,由苏联专家直接编写的和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写的讲义、教材共达101种,5569万4千5百字”。这些讲义、教材和原著介绍,对学校 and 全国理论教育工作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2017)。中国人民大学自建立之始,即摒弃了原欧美高等教育体制下的“校—学院—系”的组织模式,而采取苏联式的“校—系—教研室”的组织结构模式。为了使高校的人才培养与当时国家建设事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相符合,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按苏联模式对高等学校进行了学科调整,减少了综合性大学的数量,设置更多的专业性大学。在学科和专业设置上,倾向于专业范围越来越窄,专业种类越来越多。

到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从形式到内容,已经完全复制了苏联高等教育体制。与同期的苏联财政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此时的财政学苏联化已经完成。在当年的高教会议上,中国人民大学向全国推广了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然而,这场由政治力量推动的学习苏联运动,由于急于取得成果,也产生不少问题。比如,由于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差太远,一时很难做到将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于是,就产生很多生搬硬套的现象。翻译过来的苏联教科书,其中所涉及的苏联财政工作的经验,更是难以应用到中国的财政工作中。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对全面学习苏联运动和苏联财政学的反思问题。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在中国与旧财政学决裂,而又无力自行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财政学的当口,将社会主义先行者苏联的财政学照搬引进,不啻是直接而又保险的办法。但是,苏联版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苏联财政学适用于中国吗?“苏联财政学”的典型特征是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后来的“去苏联化”?“去苏联化”的目标最终实现了吗?厘清上述问题对当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合理吸收利用域外学术资源、创新和发展中国财政学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苏联财政学的产生、历史贡献和主要内容

作为一个政权,苏联前后存在了74年时间,这期间不同历史阶段的财政学并不完全一致,本文重点研究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直接来源于斯大林政治经济

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实践的苏联财政学,这一时期的财政学在苏联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仍然有着影响力。正是这一阶段的苏联财政学在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大背景下被全方位地引入中国,并对中国当代财政学的发展产生了持久影响。

(一)苏联财政学的产生及其历史贡献

1. 苏联财政学的产生(1930—1950年)

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在一个封建军事帝国的基础上建成的,此前的俄罗斯帝国是一个科学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和意大利、英国,甚至是德国、法国不同,历史上的俄罗斯帝国不曾拥有成体系的本土经济学,更遑论财政学(Barnett, 2005; Sheptun, 2005)。

苏联建国之初,国家财政的中心工作是维护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建构财政理论的任务尚不紧迫。20世纪30年代初,经历了苏联国内和苏共党内的多次斗争与清洗,斯大林巩固了自己的统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入常规轨道,1936年苏联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从而具备了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经济政策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相应条件。20世纪30—50年代,苏联完成了联共(布)党史、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财政学得以产生和逐步发展,20世纪50年代早中期,苏联财政学理论体系最终确立(弗·吉雅琴科,1958)。

2. 苏联财政学的历史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国家财政的存在是工具性的,它本身不是目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财政是掌握国家权力和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用来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工具,它建立在向劳动人民抽税的基础上,为保证资产阶级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服务。那么,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国家财政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马克思曾论述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财政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法兰西革命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革命者未能掌握国家财政,导致资产阶级的军队继续获得资助。因此,无产阶级夺权后仍然可以利用国家财政(如借助高额的税收),作为向私有财产制进攻、防其复辟的工具。至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的财政问题,马克思没有机会看到,也无从论述。苏联财政学基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财政实践,发展了经典作家提出但没有来得及完成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这是人类历史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学的首次理论尝试,也是苏联财政学最大的历史贡献。

(二)苏联财政学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来源

苏联财政学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后续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由于它与苏联革命和国家建设的现实需求紧密交缠,因而它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理论。一方面,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财政思想的发展。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切断了与过去时代非马列主义文化传统的联系,而致力于构建具有苏联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苏联财政理论与其他理论(如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同时诞生,它们彼此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另一方面,苏联财政理论在其形成和确立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与苏联政治实践和财政实践相互交织,无法将三者完全分离。其后果是,一些苏联政治和财政实践中的具体做法,也参与了苏联财政理论的建立过程。作为后来者,中国在“移植”苏联财政学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联系中国实际,主动对苏联财政学理论和实践来源的各组成部分加以区别对待。

要理解苏联财政理论,需要回到该理论形成的特殊时代。1938年,在斯大林亲自主持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下文简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正式出版,它成为此后若干年里联共(布)历史的正本,斯大林还亲自写下了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即《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斯大林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整个苏联社会的科学研究(也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世界观与方法论。1954年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正式出版,该书的创作历时17年,同样是在斯大林主持和积极干预下完成的。在讨论该书未定稿的过程中,曾就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斯大林关于该问题的结论及随后形成的相关文件,汇编成1952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它既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也回答了当时争议较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问题,成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敲音定调”之作(马闪龙,2015)。由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权威性”,该书所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则和模式,虽然历经多次现实改革与理论修订,但直到戈尔巴乔夫前期仍难以撼动。以上三本著作奠定了苏联财政学的理论底色,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以上著作体现的思想、方法和论断都成为绝对的、不可挑战的权威,它们深刻影响了同一时期形成的苏联财政学。

(三)苏联财政学的主要内容与结构

苏联财政学围绕“货币关系论”而展开,时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苏联专家阿·米·毕尔曼(1955)阐述了当时苏联主流财政理论——“货币关系论”的逻辑。

首先,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中,存在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也还存在两种公有制。这就决定了在这两个时期中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价值法则还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因此也决定了其利用价值和货币形式。其次,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表明,在生产、分配和商品流通中还使用货币,社会再生产过程(生产、分配、消费)是借助货币资金的周转来进行的。货币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是生产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最后,财政是进行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工具,这种分配和再分配是以货币形式进行的。因此,财政科学只有一个客观的对象——作为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而客观存在的货币关系,也就是形成这种货币关系的规律性、表现、方法、作用范围以及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关于苏联财政学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我们援引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翻译并用作课本的《苏联财政》(A. M. 亚历山大洛夫,1953)一书^①进行介绍。该书是20世纪50年代早中期中国引入的苏联财政学的代表性作品,全书内容可分为两部分。

1. 苏联财政学基础理论

基础理论部分论述苏联国家财政的社会主义本质与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有何不同,介绍财政学研究的方法论、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以及苏联财政的设计原则等。(1)关于财政学的研究对象。该书认为,苏联财政课程的研究对象是“有关用来保证全国性的货币资财基金以及国营企业非集中货币资财基金的形成和使用的货币关系的理论,关于实现这些关系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它们在解决我国共产主义建设任务中的作用的理论”^②,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货币关系论”。(2)关于财政学的方法论。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家财政学这门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就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具体地,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学说,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积极相互作用”的学说,关于“苏维埃国家的实质与职能诸学说”的基础上,才能对苏联财政的内容和作用,获得正确的理解。^③(3)关于财政学的任务及其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该书认为,“国家财政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专门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① [苏]A. M. 亚历山大洛夫:《苏联财政》(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版。

② [苏]A. M. 亚历山大洛夫:《苏联财政》(上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版,第3~4页。

③ [苏]A. M. 亚历山大洛夫:《苏联财政》(上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版,第1页。

的方法,来阐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和性质,以及指导生产与分配的在客观上起着作用的经济法则。因此,它要阐明社会主义经济范畴的实质,其中包括与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有关的范畴,如价格、信贷、财政等。^① 因此,财政学的任务就是要“阐明国家财政的实质和意义,国家财政在完成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积极作用和整个财政体系及其各个环节的建立原则”。^②

2. 苏联财政实践的经验总结

苏联财政课程的另一部分,是对苏联各个历史时期财政发展与财政政策的概括。在苏联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关的内容有所区别。在这本书中,关于苏联财政实践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国家财政在社会主义建设各阶段的发展情况,以及在实现党及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各财政环节(预算、社会保险、国家保险、储金局)的内容和特征;社会主义企业及各经济部门的财政、预算设计和财政监督诸问题;苏联财政建设的经验对于正在苏联帮助下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意义。

(四)苏联财政学的典型特征

从分析框架来看,苏联财政学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向财政领域的理论延伸。因此,苏联财政理论以论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为分析起点,为了维护和发展这一制度,才有必要利用财政工具(税收、预算等)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筹集和分配货币资金。

从国家观念上来看,苏联财政学建立于一种独特的有机主义国家观之上,把国家看作目标明确的组织和全知全能全善的全社会利益的代表。在苏联财政学中,苏维埃国家的目标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③ 国家并不依赖于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实现这一美好目标,相反地,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苏联财政学建立在国家统领市场与社会的统制经济基础之上。因此,国家覆盖市场与社会。由于国家主导社会资源的配置,市场和社会的运行都受政治规则的主导,市场和社会的存在只是形式上的,并不存在真正的市场交易与社会合作机制。因此,国家直接通过有计划按比例地运用社会资源,而不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满足全社会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就方法论来说,苏联财政学是方法论集体主义的,不仅以“阶级”为分析单位,其作为目标的“社会需求”的满足,与真实的个体无关,并不在乎个体的偏好表达;相反,社会的需求是由国家发现的,并由国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予以满足。就国家的能动性来说,苏联财政理论中国家的能动性远远超过同时代英美财政理论中的国家。

以上特征表明,苏联社会中的财政学家只能扮演政策阐释者的角色,其使命是在允许的政治限度内阐释苏维埃国家财政及其财政政策的优越性。苏联财政理论,由于其与计划经济和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捆绑,在僵化的意识形态下,后者成为不可讨论和逾越的政治红线,这限制了财政制度和财政学理论的创新空间,导致苏联财政理论越来越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与科学化趋势反向而行,最终因失去对现实的解释力而被抛弃。

三、苏联财政学的负面影响

苏联财政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财政学领域的创新性运用,是首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

① [苏]A. M. 亚历山大洛夫:《苏联财政》(上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版,第4页。

② [苏]A. M. 亚历山大洛夫:《苏联财政》(上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版,第4页。

③ [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页。

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学的范例,就这一点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苏联财政学是在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和计划经济模式下,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中,甚至是受苏联领导人个人权威的影响而形成的,其中的一些负面特征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参与塑造了中国财政学,并成为中国财政理论创新的羁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泛斗争思维及其扩大化

A. M. 亚历山大洛夫所著《苏联财政》(上册)明确地提到,“斯大林同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两部著作对于经济科学,特别是对于财政理论,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① 其重要性就在于奠定了苏联财政理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法强调事物发展过程中对立因素的竞争能够达成进步,马克思从经济决定论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冲突是由社会阶级的差异引起的,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即辩证运动)推动历史走向新的纪元。在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成为统治阶级,这一经济基础决定和要求统治阶级建立相应的上层建筑,以维护该经济基础,无产阶级作为对立的阶级,必然要打破现有的上层建筑,剥夺其经济基础,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及与新社会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在这个新社会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就平等地惠及每个人,使人类最终摆脱各种必然性(如基本需求)的奴役,使人的潜在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反映出他所生活时代的尖锐阶级矛盾,充满着对人类不自由命运的深深悲悯。然而,斯大林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将唯物主义辩证法应用于观察社会时,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实质,即对人和人类的终极自由的关怀。斯大林强调,“既然发展过程是经过内在矛盾的揭露,是经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彼此对立势力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当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现象。由此可见,不是要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各种矛盾,而是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是要熄灭阶级斗争,而是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② 这一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的苏联社会,无论在经济建设中还是在理论研究中,都过于强调对立和斗争的进步作用,导致斗争思维,特别是阶级斗争思维的泛化与滥用。

在外部,斗争思维导致对同时代西方财政学成就的排斥,使苏联财政理论与世界经济理论进程长期脱节,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重新融入外部世界,严重阻碍了苏联财政学科的发展。在内部,则导致将学术观点问题与政治路线问题相混淆,为了争夺理论权威和主流话语权为个人政治目的服务,一些人不惜运用政治手段打压理论异见,破坏了正常的学术环境,使财政学术研究长期陷于政治化的泥潭难以自拔,真正的科学精神与科学追求遭到毁灭性打击。

(二) 财政学术研究背离科学精神

苏联财政学的直接理论来源当属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承认商品和货币在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故价值规律在有限的范围内还将发挥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必要研究政治经济学。但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它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规律,教科书认为有以下方面。(1)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2)能够发现和利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是

① [苏]A. M. 亚历山大洛夫:《苏联财政》(上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2页。

② [苏]斯大林[1938]:《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1年版,第12页。

苏维埃国家,它知道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什么,并且能够利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规律来促进其实现。(3)当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满足不了这一社会需要时,苏维埃国家则运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通过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进步。(4)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用来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手段。(5)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财政有必要继续存在,并作为一种货币关系发挥作用。“社会主义的财政体系是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有计划地建立和分配货币资金的体系。它包括国家预算,信用,国营社会保险,国营道路保险和人身保险,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和工艺合作社的财务。”^①(6)社会主义财政虽然保留了资本主义财政的形式(预算、税收、公债等),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财政的性质,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其他经济规律所决定的。(7)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其他经济规律是……

上述(1)~(7)条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断,构造了一个逻辑上的闭环系统,将其中的第(5)、(6)条展开,即为苏联财政理论,它构成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苏联财政学就是在这一闭环系统里自我强化其理论逻辑的。作为苏联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要从理论上论证苏联现行制度的合理性。它的每一组成部分都包括财政学,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标,苏联财政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化是必然结果。这一结果,导致苏联官方及财政学术研究拒不承认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成就,放弃了一切科学研究应有的科学态度;在苏联国内,则造成财政理论争鸣的消失,理论研究被政治宣传所取代。

(三)财政科学研究失去应有的独立性

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所有的学术研究都被设定了框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苏联理论界已经没有不同声音了。“为了能够活下去,人们要么完全脱离学术工作,要么完全更改学术专业,停止研究经济理论问题,要么投入执政党领导发起的同‘人民敌人’斗争的运动”(希罗科拉德,2012),财政科学研究被高度政治化的行为所裹挟。

这时的苏联财政学完全丧失科学研究应有的独立性。在学术工作中,“用一些老生常谈和滥用引文来代替真正的科学分析”的做法十分常见。理论研究中充斥着“苏联财政的内容和作用,只有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著作……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这样的大话套话(希罗科拉德,2012)。斯大林去世之后,虽然财政学研究不再唯其是举,但斯大林时代的精神和政治遗产主宰着此后的财政学理论及研究长达几十年。

在与外部世界隔绝的情况下,在领袖人物和官方认定的有限“学术”空间内,仅仅基于集中计划经济下的苏联财政实践,苏联财政学家不可能从实践中提炼出一般意义上的财政理论,对提出的问题也不可能给出科学论证。因为缺乏真正的科学研究做支撑,苏联财政学常常在大量的政治说教和辩论的同时,充斥了各种各样的苏联财政工作实践和政策内容。苏联财政学教材除了上述与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之外,其余章节均为苏联财政工作的经验部分。这种基于正统意识形态、部门工作描述和简单提炼的财政学,既称不上真正的理论,也难以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一旦生搬硬套到其他国家,肯定会“水土不服”,在中国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学术研究政治化既窒息了苏联国内的学术空气,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随着苏联财政学移植到中国,其所具有的上述问题也被一同带入,导致新中国成立以后30多年财政学的发展在很多方面重蹈苏联覆辙。

① [苏]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四、“去苏联化”与中国财政学理论创新(1956—1964年)

(一)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

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先行优势助力斯大林通过直接干预苏联国内理论界的工作,一步步地垄断了马克思主义解释权,建立了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并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苏联革命和建设模式,推广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后来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始的困难时期,效仿苏联、“一边倒”是可以理解的,苏联也确实给予了中国可贵的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分歧和摩擦。1953年斯大林逝世成为一个转折点,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掀起了重新评价斯大林的运动。中国结合国内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开始对过去全面学习苏联过程中出现的教条主义、脱离中国实际的现象进行反思。此后,学习苏联的指导方针逐渐发生了变化。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的重点是要突出“以苏为鉴”,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于苏联方面暴露的缺点、错误和走过的弯路,要“引以为戒”(沈志华,2015)。

1956年1月,周恩来进一步号召大家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而不仅限于向苏联学习。同年8月,毛泽东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讲话中,提出反对教条主义,他以历史上的白区工作为例,指出“在政治上我们吃过教条主义的亏,什么都学习俄国,结果是大失败”。由于诸多分歧的存在,此时的赫鲁晓夫也开始考虑撤回援华专家,这就更促使党内高层思考如何摆脱对苏联的依赖,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方针。从这一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一改过去照搬苏联学科体系的做法,几乎所有的系都开始修订其课程大纲。同年6月,根据毛泽东关于财政部要加强财政经济问题研究的指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以开展中国自己的财政问题研究。此后,中国人自己写作的、基于中国实际情况的财政学教科书逐步取代了苏联财政学和以苏联财政学为基础的相关教材。建立中国自己的财政学的任务,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二)“国家分配论”主流地位的确立

20世纪50年代引入的苏联财政理论,即“货币关系论”,并未得到中国学者的普遍认同。由于当时正处于向苏联全面学习的年代,尤其是经过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中期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很多学者囿于形势和压力,不能发表不同意见。然而,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一字之差意味着苏联权威的消解,这一信号也在学术界引起反响。

反对苏联“货币关系论”观点的,除了以许廷星、邓子基等为代表的“国家分配论”学者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者。这些观点在1964年的“大连会议”上得到了综合展现。“大连会议”是中国财政学界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理论研讨会,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学术问题: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和范围、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税收的作用、信贷平衡和物资平衡的相互关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1965)。

所讨论的三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最为基本,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由于相关文章均是针对苏联的“货币关系论”而提出的,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国财政学界最终摆脱了苏联财政理论的束缚,开始独立构建自己的财政学的标志”。各方虽有分歧,但因绝大多数参会者对国家分配论的部分或全部观点有共识,因此,此次会议也被看作“国家分配论在中国财政理论界主流地位最终确立的标志”(张馨等,2000)。

(三)财政的本质

财政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这次讨论会最重要的主题。与会学者主要提出了四种观点。一是

认为社会主义财政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分配社会产品的关系,可简称为“国家分配论”。二是认为社会主义财政是以价值形式进行的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可简称为“价值分配论”。三是认为社会主义财政是社会主义国家资金运动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可简称为“国家资金运动论”。四是认为社会主义财政是剩余产品价值的生产、分配、使用,即剩余产品价值的运动过程,可简称为“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①

由于上述讨论发生在与西方经济学隔绝的背景之下,其论述方式受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框架影响极深,今天的读者对其难免有几分隔膜。为了能够清晰地了解这些讨论的含义,笔者将上述问题加以提炼,用当代中西方通用话语体系来重新梳理。简言之,上述观点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财政与国家的关系

多数意见认为国家产生在前,财政产生在后,财政因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如“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同国家有本质联系,财政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由于最初产生的是剥削阶级的国家,而剥削阶级的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剥削阶级为了维持这个工具,就需要捐税和国债,于是产生了凭借国家权力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这就是财政。财政从来都是专政的工具。离开了国家,离开了专政,就不能认识财政的阶级内容,不能认识财政的本质。可见,在国家分配论看来,一旦离开阶级内容,财政的本质则无从谈起。

一种持异议的观点,比如主张“价值分配论”的学者认为,财政是个价值范畴,是价值形式的分配关系;财政同国家并没有本质联系,而是同商品货币经济有本质联系;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分配之所以是财政,不是因为这种分配是由国家决定的,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的,而是因为国家所进行的这个分配是以货币形式进行的,如果没有货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就没有国家财政了。^②“价值分配论”立论的基础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在其看来,国家是上层建筑,财政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反过来,所以,国家不能决定财政。从“价值分配论”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苏联“货币关系论”的影子。

另一种被提及的异议观点是“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主张“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的学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内容)只是社会主义财政存在的前提,不是它的原因,社会主义财政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只能从全民所有制内部矛盾中去找;认为社会主义财政只同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国家有本质联系,财政同作为政治权力的国家没有本质联系。然而,该观点由于“否定社会主义财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联系”,“遭到了大多数同志的反对”。

2. 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国家应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还是仅仅外在于社会经济活动?如果应当参与,那么,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国家分配论”认为国家应当全程参与社会经济活动,通过财政这只手,在C、V和M各个部分都参与集中和分配资源,以此控制整个经济的全部运行过程。这一论点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吻合,既是对现实的写照,也给现实以学理阐释。而“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则认为,“只有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才能用于社会的共同需要”,“社会主义财政是相对独立的剩余产品

①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论文讨论会论文选辑》(下册),中国财政出版社1965年版,第202页。

②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论文讨论会论文选辑》(下册),中国财政出版社1965年版,第203页。

价值的运动。同社会主义财政真正有关系的只是 M 部分, C 的部分财政是可管可不管的”^①。大会总结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 认为“把社会主义财政限于 M, 这是缩小了财政的范围, 把简单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补偿放在国家计划之外, 是不利于巩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② 用今天的观点来看, “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一统财政提出了否定的意见, 因此在当时受到了批判。

3. 财政的范围及职能

这一问题实际是上两个问题的延伸。如果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是无所不入, 那么, 财政的范围一定非常广泛, 反之则不然。即便如此, 在具体的细节问题上, 同一观点内部也有差异。比如, 同样是主张“国家分配论”, 有人认为国营企业财务属于财政范围, 也有人认为国营企业财务中只有同国家预算上缴下拨关系的部分属于财政; 有人认为银行信贷不属于财政, 有人认为银行信贷中的长期借款部分属于财政范围。主张价值分配论的学者则认为, 社会主义财政除了包括国家预算、国营企业财务全部、银行信贷全部之外, 还要加上集体经济财务。用今天的话语来说, 上述讨论其实是在探讨财政的范围、职能和财政预算的不同口径。

4. 国家与其他社会经济主体的关系

不管如何看待财政, 都存在是否承认其他经济单位主体性的问题。也就是说, 我们的社会应该是多主体的还是单一主体的。在“国家分配论”看来, 由于国家统领政治、经济和社会, 可以凭借其权力强制、无偿地分配社会总产品, 因此, 国家就成了财政分配关系中当仁不让的“主体”, “财政就是凭借国家权力的、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 无产阶级必须凭借政治权力积极干预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 由此形成的以无产阶级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这就是社会主义财政。”^③这种单一的主体观受到了其他观点的质疑。例如, “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认为, “作为分配关系的财政关系不能只有一个经注主体, 单个主体不能形成分配关系, 分配关系总是几个(至少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④

(四) 中国财政学体系初建

自 1956 年以来, 中国财政学者在尝试构建“中国自己的财政学”的动力之下, 逐渐形成了区别于苏联财政学的理论体系。除了上述“财政本质”名义下的相关基础理论问题探索, 中国财政学者还在中国自己的财政实践中, 对中国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平衡、财政体制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刘守刚, 2009)。以中国人民大学多年的财政学教学讲义为基础,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1964)集体编著的《财政学(初稿)》, 于 1961 年完成了第一稿, 1964 年春正式出版, 该书汇集了当时中国财政理论界的集体智慧, 作为中国特色财政学体系的探索, 获得了普遍认可。

(五) 中国财政学是否实现了“去苏联化”的目标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 中国财政理论试图超越苏联财政学, 构造符合中国实际的财

①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 年财政学论文讨论会论文选辑》(上、下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65 年版, 第 205 页。

②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 年财政学论文讨论会论文选辑》(上、下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65 年版, 第 206 页。

③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 年财政学论文讨论会论文选辑》(上、下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65 年版, 第 203 页。

④ 王绍飞:《财政学新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9~10 页。作为参会者, 王绍飞研究员当时未来得及提交论文, 因此这里引用的是其 1984 年著作中表达的观点。

政学理论体系,人们一般将之解读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的首次创新。至于创新表现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财政学范式,则几乎无人深究。多数人倾向于认为,苏联的“货币关系论”仅仅停留在对财政资金运动的表象描述上,不能揭示财政的本质;而中国学者透过现象认识到了财政本质,将其理解为以国家为主体的一种分配关系,以“国家分配论”取代“货币关系论”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中国财政理论的创新性。

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对苏联财政学的误解。事实上,苏联财政学从未否定国家在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在苏联财政理论中,国家的主体地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因此,苏联财政学对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这一性质本身少有论述,而专注于以货币资金表现的财政运行过程。在最根本性的一点上,中国的“国家分配论”与苏联的“货币关系论”是完全一致的,即财政的性质须从国家的阶级性来解读。当时中国的其他财政学理论流派,如“价值分配论”“国家资金运动论”在这一点上也都同样追随苏联财政学传统。唯一挑战了苏联财政学传统的是“剩余产品价值运动论”,它否定了财政与政治国家的本质联系,反对国家以财政手段全面干预经济运行,实际上就是反对国家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力过度干预经济,反对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然而,这一理论在当时受到政治批判,并未在理论界产生实质影响,也无法代表当时的中国主流财政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要说当时的中国财政学整体上摆脱了苏联模式,是相当勉强的。在文章第二部分,我们归纳了苏联财政学的基本特征,如果将当年中苏两国的财政理论进行比对,不难发现,在这些最基础的财政理论问题上,中国主流财政理论的确并未超越苏联财政学范式。

(六)苏联财政学范式为何难以超越

20世纪50年代引入中国的苏联财政学范式之所以难以超越,原因是多方面的。新中国财政学初建于20世纪50—60年代,苏联财政学形成于20世纪30—50年代,若将两个时期的中苏两国做一对比,不难发现,在影响财政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上,二者极为相似。首先,二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思想与价值观念一致,中苏两国都奉行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体制。其次,二者所对应的社会经济制度一致,都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最后,两国财政理论的经济学基础是高度一致的,都是斯大林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即使与苏联关系恶化之后,毛泽东仍然倡导并带领学习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见,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试图建立的新财政学与苏联财政学,无论在价值观念上,还是在理论源头和实践来源上,都高度重合,这是中国财政理论长期难以摆脱苏联财政理论影响的首要原因。此外,受苏联影响,1949年以后中国财政学界与西方主流财政学自觉隔离,忽视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成就,使财政学在中国的发展失去了必要的理论竞争与对话,难以走出苏联财政学闭环话语体系下的自我复制。这是中国财政理论难以突破苏联财政学的另一原因。

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财政理论名义上走出了苏联财政学,但事实上并未走出塑造苏联财政学的思维模式。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新的学术资源尚不能与既有的学术传统抗衡,并且新的学术群体尚未成长壮大,导致20世纪80年代的财政学争论仍然局限在苏联财政学的话语体系中,其关注的研究主题,可以看作过去30年里财政学争论的回响。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财政学及其理论逻辑对中国财政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学的发展,影响了财政学科学化、国际化的进程。

五、结 语

20世纪50—6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财政学在中国的初建时期,也见证了苏联财政学传统的移

人和退出。苏联财政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财政学领域的创新性运用,是首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财政学的范例,就这一点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开拓意义,它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可以用来借鉴的范例和进行批判的靶子。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以历史的眼光客观评价它。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财政学毕竟是在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和计划经济模式下,在当时特定的苏联内外政治环境中,甚至是在其领导人利用个人权威直接干预之下而形成的,有着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在向中国移植过程中,苏联财政学的弊端也被引入中国,参与塑造了新中国财政学,并产生了持续的负面影响。正如文中所分析的那样,苏联财政理论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促使中国学者思考走自己的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家建设的思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模式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由此,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苏联财政学式微,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学兴起。

苏联财政学在中国的进退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反映了两个先后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理解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上的复杂关系。探求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努力的一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政被定位于“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极大地提高了财政在整体国家体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推动中国财政学在新时代背景下寻求创新。在创新和发展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过程中,苏联社会及其财政理论曾经产生的问题,给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值得反思与铭记。

发生于2019年岁末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全中国也给财政学界上了一堂代价高昂而又意义深远的实践课。那些在以往研究中缺乏情感冲击力的“国家治理”“政府责任”“事权分配”“多元主体”“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权利与义务”“秩序与自由”等名词,以极端方式强行进入大众视野,让人不得不认真反思,我们平常所强调的“重要支柱”到底有多重要,平常所强调的“基础”问题到底有多基础,它们究竟值得我们花费怎样的心力去持续、坚定地推进研究?的确,如何回归初心、以人为本,回归科学见解、放下无谓争论,寻求有序自主社会治理、放下统制对抗传统思维,这既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财政学和财政学者留给我们的问题,也是我们自身处境所要求的、当下和未来都应全力以赴的财政理论和实践课题。

参考文献:

- [俄]Л. Д. 希罗科拉德:《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政权》,郑异凡译,《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5期。
- [苏]A. M. 亚历山大洛夫:《苏联财政》(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版。
- [苏]阿·米·毕尔曼:《论财政科学及其各学科的对象》,《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10期。
- [苏]弗·吉雅琴科:《论苏维埃财政的本质和职能问题》,载弗·吉雅琴科主编《财政理论问题》,王效培译,财政经济出版社1958年版。
- [苏]斯大林[1938]:《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1年版。
- [苏]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 [苏]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主编:《财政学问题讨论集——1964年财政学论文讨论会论文选辑》(上、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5年版。
- 丁方、罗毅:《新财政学教程》,十月出版社1951年版。
- 胡锡奎:《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的总结——在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举行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上的报告》,《人民教育》1954年第6期。
- 刘守刚:《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近现代中国财政转型与政治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2. 马闪龙:《苏联计划经济走过的坎坷道路》,《探索与争鸣》2015 年第 2 期。
13. 马叙伦:《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上的开幕词(1949 年 12 月 23 日)》,载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14.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15. 毛泽东:《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16. 千家驹:《新财政学大纲》,上海三联书店 1949 年版。
17. 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18. 粟寄沧:《新财政学教程》,新潮书店 1951 年版。
19. 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
20. 王绍飞:《财政学新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4 年版。
21. 伍丹戈:《论国家财政》,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 1951 年版。
2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23. 夏国祥:《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财政研究》2011 年第 3 期。
24. 杨悦:《除旧布新:一九四九年北京大学文、法学院的课程改造》,《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 年第 2 期。
25. 尹文敬:《国家财政学》,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 1953 年版。
26. 张馨、杨志勇、郝联峰、袁东:《当代财政与当代财政学主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27. 中国人民大学编辑:《中国人民大学第二次科学讨论会财政组报告提纲》,中国人民大学 1951 年版。
28.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编著:《财政学(初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4 年版。
29.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编:《人大档案记忆(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30. 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5 期。
31. Barnett, V. A., *A History of Russian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2005.
32. Shepton, A.,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and Russian Economic Thought*.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32, No. 4, 2005, pp. 349 – 374.

Fiscal Theory as a Discipline During the 1950s—1960s in China: The Transplantation and Withdrawal of a Tradition

MA Ju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0028)

Abstract: The 1950s—1960s was the initial perio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xist fiscal theory as a discipline in the newly-founde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witnessed how the Soviet tradition of fiscal theory was first transplanted into and then removed out of China as well. As a mixture of Sovietized Marxism, the political practices and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of the Soviet Union in a special era, Soviet fiscal theory had its own historical limitations inevitably though it made a seminal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t fiscal theory. Along with the transplantation, some of its negative facets were manifested in New China's reconstruction of fiscal theory and played long-term fetters to the latter. As for the reason why China failed to “de-Sovietize” fiscal theory since the late 1950s, it i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thinking mode which shaped the Soviet fiscal theory still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China's fiscal academia at that time. Meanwhile,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had a lot in common in thos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s of fiscal theory. Drawing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China's transplantation of Soviet fiscal theory in the 1950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foreign academic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Marxist fiscal theory in current China.

Keywords: Soviet Fiscal Theory, Fiscal Theory in New China, Marxist Fiscal Theory

JEL: B14, B24, P51

责任编辑: 汀 兰